

澳门的兴衰与人口变迁

陈衍德

16世纪以后,随着东西方贸易的频繁与增长,东南亚和中国东南沿海陆续兴起了一批海港城市,它们在东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每一个东亚港市的兴衰都与其人口的聚散密切相关,二者是互为因果的。研究这一动态发展过程,可以从中透视东亚经济起伏的玄机与线索。澳门在东亚诸港市中是比较独特的,它处于这样一种边缘地带:中国政府既对它采取特殊政策而又无法完全控制它,葡萄牙人也不能像在其它殖民地那样为所欲为,而要顾及中国政府的反应。所谓特殊政策,指的是明、清政府在坚持其主权之同时,^[1]允许商民在澳门相对自由的环境下与葡商及其他外商进行贸易。而葡人之所以要顾及中国的反应,也正因为澳门的制约因素主要来自中国内地,这种制约因素包括政治和经济的。澳门港市的这种独特性,决定了其盛衰不仅与海上贸易有关,而且与中国内地的政治、经济局势有关。同样地,澳门人口的变迁既取决于海上贸易的升降,又取决于中国的政治变局与经济起伏。澳门兴衰与人口变迁的双向互动,便比东亚其它港市显得更为复杂与曲折。

本文拟以澳门社会经济的盛衰为背景,论述16世纪中叶至20世纪末澳门人口的发展趋势,并从中探察澳门这一东亚海港城市的历史轨迹。以下按明、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时期为序加以论述。

一、明朝时期

澳门历史上隶属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珠海市),位于珠江口南端,与香港分处伶仃洋东西两侧,是天然的渔港和商港,总面积18.98平方公里。宋元时期澳门主要是东南沿海各地渔民避风停泊的场所,香山县居民时而来此采石,亦有零星的海商在此作短暂停留,常住居民不多,数目难于查考。

明中叶以后,随着沿海及海外贸易的增长,澳门的常住居民逐渐增加。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商初登澳门,至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葡人在澳事实上形成商埠雏形,然均属私占性质。万历元年(1573年)葡人始向明朝地方政府缴纳地租,澳门至此成为官方认可的商埠。^[2]澳门商埠的形成,一方面是葡商和其他外商在澳人数渐多所致,一方面还要有一定数量的中国居民,否则葡商和其他外商的日常所需,以及他们意欲雇佣的人手,便无从谈起。而商埠的繁荣,海上贸易的兴盛,又吸引了更多的中外人口来到澳门。

嘉靖三十二年至崇祯十三年(1553-1640)是澳门历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以澳门为始发点的航线伸向世界各个角落,其中最主要的有至日本长崎的航线;至菲律宾马尼拉再延伸至墨西哥的航线;经马六甲至印度果阿再延伸至葡萄牙的航线。“从马六甲向澳门出口胡椒和香料,从澳门向日本出口丝绸和黄金,从日本向澳门出口白银,从澳门向果阿运回丝绸、铜和贵金属”。^[3]背靠中国大陆的澳门成了联结亚、欧、美三大洲的贸易中转港。就在盛极而衰的1640年代初,“澳门总人口估计为40000人,其中约有20000人是葡萄牙人或具有葡萄牙血统”。^[4]这是澳门历史上第一个人口高峰。

澳门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从偏僻的小渔村到繁荣的海港城市的转变。根据葡萄牙方面的文献记载,1560年代之后,澳门“是葡萄牙人一个很重要的居住中心——可能比孟加拉湾任何一

个居民点的规模都大”；^[5]“1585年葡王陛下授予马交城（即澳门）以城市地位，定名为阿妈神（即妈祖）之城”。^[6]所有这些都表明，澳门已经具备了海港城市的功能。而以葡人为主的长住澳门的外国人，在这一时期不仅数量增多，而且成分日益复杂。

数量方面，“1578年有个耶稣会士访问该地区之后说，居民由持各种信条的人组成，约有万人左右”；而一位叫安东尼奥·博卡里奥的葡人在1635年的信中写道，澳门在“1630年日本—马尼拉贸易全盛期的总人数可达二万人上下”。^[7]亦即半个世纪内人口数量翻了一番。如上文所示，10年之后，澳门人口又再次翻番，达到四万人左右。如果葡人及与之有血统关系的人一直占总人口半数的话，那么60年内这两类人的数目便从5000人增加到20000人。

成分方面，葡萄牙官方文献将其亚洲居民分为“已婚居民”、士兵、传教士和官员四类。其中的“已婚居民”专指居住在“葡属印度”管理之下的地方的人，是数量最多的一类。澳门属驻在印度果阿的葡萄牙总督之管辖（尽管中国并不承认其为殖民地），其“白人已婚居民”登记在册者有850户（1635年），另有同样户数的“黑人已婚居民”（土著居民）。^[8]这一数字显然并不完全。此外，“这些家庭（白人已婚居民）一般都有6名能作战的奴隶，其中人数最多和最能干的是黑人”。^[9]官方文献一般未予记载的则有背叛宗教信仰者、流氓或流浪汉、逃兵或叛逃人员等。再加上短期在澳居留的海员和商人，就使得澳门的外国人成分十分庞杂。如果再考虑到中国、日本的土生葡人以及葡中混血儿、葡日混血儿等，情况就更加复杂了。

中国方面的文献也记载了澳门城市发展及外国居民增多的情况。明嘉靖后期任广东御史的庞尚鹏在给朝廷的奏文中说，夷人“近数年来，始入濠镜澳筑室居住，不逾年多至数百区，今殆千区以上。日与华人相接，岁规厚利，所获不赀。故举国而来，负老携幼，更相接踵，今夷众殆万人矣”。^[10]如此则中国官方作出澳门外国人数目达万人的估计，在时间上比葡方大约早了20年。其它记载如“趋者如市，民夷杂居”，^[11]“雕楹飞甍，栉比相望”^[12]等，更比比皆是。中外文献的相互印证，在在说明此间澳门的兴盛和人口的剧增。

这一时期在澳门的中国居民主要来自广东和福建沿海。崇祯三年（1630年）五月礼科给事中卢兆龙上言：“闽之奸徒，聚食于澳，教诱生事者不下二三万人。粤之盗贼亡命投倚为患者，不可数计。”^[13]这一说法比葡人博里卡奥的1630年澳门总人口为两万人之说（华人若居半则为一万人）多出许多，显属夸张。不过另一份葡方文献在谈到1630年代澳门的中国居民时也说，“它的市民比该国的其它任何城市都更多”。^[14]显然这也含有很大的夸张成分。尽管如此，此间澳门中国居民众多这一事实，毕竟得到中外文献的共同认可，此点应无疑问。

明朝的最后几年，亦即崇祯十三年至十七年（1640—1644），是澳门盛极而衰的转折点。1639—1640年间日本德川幕府驱逐葡萄牙人，澳门与长崎的贸易被迫中断。1640年葡萄牙与西班牙由合而分，澳门与马尼拉的贸易亦告中止。1641年荷兰从葡萄牙手中夺取了马六甲，澳门经马六甲海峡至果阿的航线亦受阻。由于外商货源顿受挫折，澳门与中国内地的贸易便受到严重影响。

但这一形势并未立即使澳门人口下降，反而在短期内使其人口上升，这主要是日本大量驱逐葡商、葡日混血儿及日本基督徒所致。其实这种驱逐行动在更早的时候就发生了，只不过到此时才加剧并显示出后果。“1570—1636年长崎成了葡萄牙血统的日本人很活跃的城市，可是到了1636年，住在这里的所有欧亚混血儿以及他们的日本妻子、母亲统统都被赶到了澳门”。由于这部分人口的剧增，在澳门“就自然地形成了一条街，除了有葡萄牙人的妻妾、奴仆外，还有商人、教士”。此外，“在澳门的日本人街区里，也有一些艺术家和工匠”。^[15]这部分人口不仅增加了澳门的人口总量，而且构成了澳门人口的新的成分。

黄启臣、郑炜明著《澳门经济四百年》综合历代中外统计资料，得出澳门数百年来的人口发展数据，其中明朝时期的数据为：1555年400人；1563年5000人；1578年10000人；1580年20000人；1600年2000—4000人；1621年8200—8300人；1640年40000人。^[16]由于统计资料来

源广泛,矛盾之处不少,有的也并不可信。但总的发展趋势还是反映出来了,亦即明朝时期澳门人口大体呈上升趋势,并且增长的速度还是相当快的,在85年中增加100倍,从而反映出该时期澳门经济飞速发展的态势。

二、清朝时期

明末清初,当澳门海上贸易受挫而从繁荣的顶峰跌落下来时,中国时局的变化加剧了澳门的由盛而衰。明末因葡商大量走私影响了明朝岁入,广东地方当局便于崇祯四年(1641年)停止了他们一年两度赴广州的定期贸易,改由中国商人载货下澳门与之贸易。崇祯十三年(1640年)明廷正式认可了这一作法,后来清朝沿用了这种制度。这无疑增加了葡人与内地通商的障碍。

明、清政权的交替又使澳门雪上加霜。“由于明、清以来的长期争斗,给中国市场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导致大量的难民不断地涌入澳门”。^[17]再者,明军集中对付满族军队,“这便使得东南沿海(澳门正处于这一范围)有些脆弱,易于受到其它力量的袭击”,^[18]其中最大的威胁来自荷兰人,他们与葡人展开激烈的竞争。1644年葡萄牙“参议会向国王约翰四世呈奏信函,敦促国王无论花多大代价都要和荷兰人讲和,否则澳门连同它发展起来的四万人口将在二三年内全部崩溃,落入荷兰人手中”。^[19]不过于此可见,明清之际澳门人口似未立即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甚至因为难民的到来或许还增加了。

所幸预言中的事没有发生,而尽管与长崎和马尼拉的贸易陷于停顿,“澳门的企业家(市民)曾积极试图开发同东帝汶、望加锡、印度支那、暹罗的贸易,以取代与日本、马尼拉的贸易”,^[20]并且这种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这样澳门及其居住于此的人们才继续生存下来了。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康熙元年(1662年)清政府实行“迁界”,澳门虽获免迁,却因此也成为界外之地,其获官方允许的与内地间的贸易完全断绝。不过私商仍与澳门通商如故。中国史籍记载私商“勾结亡命,私造大船,擅出外洋为市”;^[21]“不法奸徒,乘驾大船,潜往十字门海洋(澳门南面海域),与彝人私相贸易”,^[22]反映了这种情况。

尽管如此,这次与内地合法贸易的断绝对澳门的打击是空前的。“到1669年,澳门的已婚人口下降到不足1635年的一半”。^[23]如前所述,1630年澳门人口为10000人,至1640年已发展到20000人。介于二者之间的1635年若以15000人计,则1669年澳门人口便仅有7500人。葡商和其他外商有许多人离去,应是此次澳门人口剧减的重要原因。因为“如果按(禁海)敕令字面上的意思来实行的话,以神(妈祖)的名字命名的澳门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了”。^[24]

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廷准葡使恢复澳门与内地通商之请,然只“准其在旱路界口贸易”。^[25]中断了17年的贸易得以恢复并迅速扩大,未几已颇具规模。清政府于是将“旱税”定额为“二万二百五十两”白银。^[26]这意味着此间获官方认可的贸易已恢复至明万历的水平,因彼时明朝征收的澳门“舶饷”乃二万两白银。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海禁解除,对外通商随之恢复。次年粤海关及澳门分关设立,内地与澳门的贸易仍改回由海路进行。

就在恢复通商的次年,一位名叫陆希言的华人耶稣会修士来到澳门,他看到的是长期萧条后尚未恢复的凄凉景象:“至入其境,见城无百堵,众无一族,家无积粟,凄凉满襟”。^[27]“众无一族”即不到五百人,显属夸张之辞,但亦可见当时澳门人口稀少之境况。大批外商离去尚未返回,在澳谋生的华人自然为数不多,这就是人口剧减的原因。

粤海关成立后规定:“今开海之后,现在到粤洋船及内地商民货物,俱由海运直抵澳门,不复仍由旱路贸易。”^[28]但葡人为了像明代那样独占澳门对外贸易,不惜重金贿赂广东官宪,阻止其它外国商船入泊澳门。结果是弄巧成拙,至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除葡萄牙以外,外国商船不再入泊澳门,迳驶广州黄埔。澳门未得开海之利,反而衰落了:“1685年,澳门一般资本既薄又乏信用之葡商,仅有船只10艘,至1704年,只有2艘……澳门居住区,殆已日趋于败坏

之境矣。”^[29]澳门人口在清朝开海后未明显增加,原因即在此。

由于清政府担心百姓出海贸易不归,对其统治不利,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复下令禁止商民赴南洋贸易,澳门亦在禁令之列。然而次年清廷又准葡使之请,特许其下南洋贸易如故。自此至雍正元年(1723年)清朝全面撤消此禁令为止,澳门又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此间“澳门市贸既盛,人口之日增,自在意中”;^[30]“户口日繁,总计男妇多至三千五百六十七名,大小洋船近年每从外国造船回澳,共有二十五只”。^[31]这是因为澳门独占了对南洋贸易的缘故。

雍正元年澳门失去对南洋贸易的独占之后,其经济每况愈下,其人口又不如前了。据其时为宦者所记,“今在澳之夷约六百余家,每家约三男而五女。其楼房多空旷无人居,赁华人居之”。^[32]不过乾隆以后,西方对华通商之潮流愈益不可遏止,而清政府不许夷商长往广州,于是澳门遂“为各国夷商贸易汇总之区”,^[33]“西洋各国……俱在澳门设有洋行收发各货”。^[34]随着英商成为对华贸易的主体,葡人欲排斥其他外商于澳门之外的做法也行不通了。而且清朝在澳门实行不同于其它地方的特殊政策,“香山县澳门地方,向许内地民人与各国夷商交易,与省城皆归行商不同”。^[35]澳门不像广州那样由特许的“行商”垄断对外贸易,而是任由民间商人直接与外商交易。如此则澳门人口有复升之迹象。

乾隆九年(1744年)新任澳门同知印光任制定了七项规章,其中之一为“凡贸易民人,悉在澳夷墙外空地搭篷市卖,毋许私人澳内,并不许携带妻室入澳。责令县丞编立保甲,细加查察。其从前潜入夷教民人,并窜匿在澳者,勒限一年,准其首报回籍”。^[36]然而就在这一规定颁布65年之后,嘉庆皇帝在一道上谕中还在重申“其澳内……民人眷口,亦不准再有增添”,^[37]说明尽管下了一道道禁令,百姓还是趋之若鹜地去澳门谋生并定居。而澳门人口之增长,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不过此间支撑澳门人口增长的已不是葡人的海上贸易,而是以英商为主的其他西方国家商人的对外贸易了。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在西方列强逼迫下一个接一个地开放沿海港口,澳门在中国对外贸易中享有的特殊地位一去不复返了。尤其是香港的崛起,完全取代了澳门贸易中转港的地位。尽管葡女王擅自于1845年宣布澳门为自由港,但澳门再也无法恢复昔日的繁荣了。另一方面,澳葡当局在破坏中国行使主权之同时,自1847年起不断蚕食中国领土,至1889年便占领了相当于今天澳门地区的面积。而通过1888年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葡萄牙又骗取了对澳门的“永居管理权”。

这种形势对澳门的经济及人口有什么影响呢?首先,澳门的经济支柱再也不是转口贸易,从而支撑澳门人口的主要因素也就不是正常意义上的海上贸易了。其次,随着葡占领土的扩大,澳门的中国居民之人数及所占比例都增加了,澳门的经济也日益多样化了。

澳门正常的海外贸易衰微后,一种畸形的贸易——“苦力”贸易却兴盛起来了。鸦片战争后,澳门渐成葡、英殖民者掠卖华工的基地,特别是咸丰二年(1852年)厦门爆发反抗掠卖人口的斗争之后,澳门更成为最大的“苦力”出口港之一。从1865年10月1日至1866年4月1日,“单单运往古巴一处的华工一多数来自澳门一就有13500名,分乘50艘船”。^[38]而1860—1870年间,离开澳门前往秘鲁的华工即达43301人。^[39]可见澳门已成为“苦力”的“集散地”。尽管这些被掠卖的华工在澳门只作短暂停留,但因其数量庞大,又是此来彼往绵延不断,所以构成了近代澳门畸形经济和畸形人口发展的一个面相。

1847年澳葡当局开始侵地扩界,从其占领的澳门半岛南端向北扩张。1851年和1864年,分别占领了氹仔和路环两个离岛。1883年强占关闸以南,围墙以北7个村的大片居民地。^[40]1889年又占领青洲岛。这样,居住在这些地区的中国居民,便成为澳葡当局管治下的人口。仅1883年那一次,便有望厦、龙田、龙环、塔石、沙梨头、沙网、新桥等7个村的一千多户居民被划入澳葡当局管治下的澳门地界。^[41]若以每户五口计,则此次澳门人口即增加了五千人以上。这样,澳门的中国居民人数和比例都大大增加了。而随着澳门中国居民的增加,其经济成分也日趋多样

化,除了原先的工商业之外,还增加了农业和渔业等。这又反过来吸引珠江三角洲地区更多的人到澳门谋生。

《澳门经济四百年》一书中搜集到的清代澳门人口数字有4个,即1700年的4900人;1743年的5500人;1839年的13000人;1910年的74866人。^[42]于此可见,直到鸦片战争前夕,澳门人口还远未恢复到明末清初时的水平,但清末却突增至七万人以上,大大超过了澳门历史上第一次人口高峰(1640年代初的约四万人)。据以上分析,这第二次人口高峰的到来并非如第一次那样是海上贸易繁荣的结果,而是葡占澳门地盘扩大从而划归其地的中国居民大量增加,以及经济多元化(包括带有畸形经济性质的“苦力”贸易等)使得人口容量扩大的结果。

三、民国时期

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决定了澳门是一个渔业经济发达的地区。当澳门的转口贸易衰落下去以后,其渔业经济的优势便凸显了出来。民国时期澳门的渔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1921年前后,澳门的渔民人数达到六万多人,占当时全澳门总人口的70%左右。^[43]可见渔业已成为容纳大量从业人口的最大行业。当时全澳门共有大小渔船三千多艘。除了从事捕鱼业和鱼类加工业者之外,还有许多人从事鱼类交易。澳门有许多鱼栏,就是从事水产品批发生意的中间商,1920年代澳门的鱼栏有六十家左右。

澳门的手工业在民国时期也有较大的发展。澳门四大传统手工业一造船、爆竹、火柴、神香,就是在这时期奠定基础的。造船业的主体是与捕鱼业密切相关的渔船制造和修理,这一时期澳门的三十多家船厂大都是渔船修造厂。爆竹、火柴业是民国时期澳门最为普遍的手工业。这两种手工业因技术简单,易于手工操作,因而成为遍及大街小巷的家庭手工业,相当多的人以此为生。当然也有聚集了数百上千人的手工工厂,如创设于1923年的昌明火柴厂有工700名,而广兴泰、广兴隆等火柴厂则各有工人千名以上。^[44]至于神香业,抗日战争期间,全澳门有神香作坊23处,从业者亦达数百人。四大传统手工业在民国时期容纳了澳门大量人口,是可以肯定的。

澳门与中国内地的贸易及对外贸易进入民国时期以后仍很不景气,但是日军侵华后大量难民涌入澳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又有难民自香港而来,使得局面为之一变,对内对外的商贸活动日趋活跃以至繁荣起来。在东亚大部分地区沦入日本之手时,唯有澳门成为未被日军占领的孤岛,内外贸易直线上升,成为澳门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1939年澳门人口达到创纪录的24.5万人,而这一年澳门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也达到93348340葡元,为民国以来澳门贸易额的最高纪录。^[45]这一时期澳门的主要贸易对象,对内而言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对外而言是东南亚和波斯湾地区。其输出主要是鱼干、火柴、爆竹等,输入则主要是米、糖、木材、煤炭等。其出口商品正是来自容纳了大量劳动人手的渔业和手工业,而进口商品则属维持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于此可见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澳门的商贸与人口是如何互为推动、交替攀升的。

抗战结束后,不少人从澳门重返内地和香港,于是澳门人口锐减,1945年只有约15万人,减少了一半(1942年约为30万人)。以后,澳门海外贸易又出现上升趋势,1947年外贸总额为19279万葡元,1949年增至45222万葡元,于是其人口也随之增至1949年的约18万人。^[46]

《澳门经济四百年》中有关民国时期人口的精确数字有4个:1920年的83984人;1927年的157175人;1937年164528人;1939年的245194人。^[47]1920-1927年间人口的增长可以被认为是渔业、手工业发展的结果,而1937-1939年间人口的增长则明显是日军侵华使内地百姓涌入澳门的结果。1939年出现的澳门历史上第三个人口高峰,同时也是一个突发性高峰,因为在短短两年内,澳门人口一下子增加了50%。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这一时期的澳门经济进程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1、经济困难阶段(1950-1956)。1950年朝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实行对华禁运,极大地影响了澳门经济,其外贸总额从1949年的45222万元下降至1956年的14150万元,其工厂总数也从1947年的166家减至1957年的107家。2、经济恢复阶段(1957-1962)。1957年葡萄牙允许澳门产品免税进入葡属地区,葡商至澳投资增加。新兴产业纺织业的出现,传统产业渔业、爆竹业的复苏,以及建筑业的发展等,都使澳门经济重获生机。中国内地对澳供货也大幅增长。澳门外贸的恢复因而加快,至1962年其总额已达32145万元。3、经济起伏阶段(1963-1975)。1967-1968年间澳门经历了一次经济不景气,但此前和此后澳门经济皆因博彩业(赌博业)、旅游业、建筑业的发展而获益,其工商和外贸也趋于繁荣。4、经济腾飞阶段(1976-1993)。本阶段全澳门的制造业、金融业、旅游业、房地产业等全面发展,1991年人均产值突破万元大关,次年其人均产值居世界第14位。^[48]

这一时期经济仍是影响澳门人口的主要因素。若以10年为时段标尺来观察澳门人口的变迁,则可明显看出经济萧条使人口下降,经济繁荣使人口上升,且人口增减的快慢也与经济升降的快慢一致。以下是这一组数字:1950年187772人;1960年169299人;1970年248636人;1980年316673人;1990年500000人。^[49]除第一个10年人口因经济不景气而下降外,其余3个10年人口都是呈上升态势,尤以最后一个10年人口增幅为最大,此乃经济腾飞使然。

移民仍然是影响澳门人口的第二大因素。1950年以后,澳门居民不断回中国内地或移居海外,致使本地人口日趋减少。1960年代和1970年代,因中国内地进行“文化大革命”,不断有人以合法或非法的身分从内地到澳门定居。改革开放以后,内地继续不断有人来澳定居。与此同时,旅居海外的侨胞也不断回澳定居。至1990年代初,澳门共有5万多归侨,他们是从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回归定居的,^[50]占当时澳门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是此间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人口自然增长率是影响澳门人口的另一个因素。据统计,1971-1989年间澳门出生人口共计87934人。出生率最高的是1985年,为18.7‰;最低的是1978年,为8.31‰;平均出生率为13.73‰。^[51]

本时期内出现了澳门历史上第四个人口高峰,亦即1980年的31万人,它第一次超过了1940年代的人口最高数字30万人。与1940年代的非正常情况相比,1980年代的人口数字更能反映澳门经济的繁荣对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

* * * * *

本文论述了明、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时期澳门人口在社会经济兴衰背景下的发展和演变。从中可以看出,“澳门人口的涨落,都是经济涨落的产物,换言之,经济的高涨带来人口的高涨”。^[52]然而这种导致人口升降的经济涨落在各个时期又有不同的表现,在前两个时期主要表现为海上贸易的盛衰,在后两个时期则主要表现为产业的兴替。另一方面,处于边缘地带的澳门,其人口又与发生在内地的国家、社会的变局密切相关,如明清之际的政权交替与清初的“迁界”、“禁海”政策,以及1930-1940年代的日本侵华战争,都给澳门的人口带来巨大的冲击。反过来,澳门的人口变迁又对其社会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澳门是东亚较早兴起的海港城市之一,它可被视作早期东亚港市的代表。“商业发展是城市近代化的主要动力”,“因商兴市”是港市繁荣的通则。^[53]移民被商业机会所吸引,而人口增多又使商业机会倍增,在二者的双向互动中,一个港市便兴起了。就此而言,澳门是有典型意义的。然而澳门又有它的特点,在四百多年中它的经济与人口数度出现巨幅涨落,制约它发展的因素错综复杂,不过它并没有完全衰落下去,但也没有发展成为像新加坡、香港和上海那样的现代超级港市。透过澳门的发展轨迹,并将它置于作为参照系的东亚其它港市中,进行分析和比较,或许对把握东亚近代化的道路能有所裨益。

注释:

[1]鸦片战争后中国对澳门的主权渐遭破坏,但澳门始终都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

[2]参阅施存龙:“澳门正式对外开埠问题考辨”,《澳门《文化杂志》中文版》,第33期,1997年冬季。

[3]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Sanjay Subrahmanyam)著,何吉贤译《葡萄牙帝国在亚洲:1500-1700 政治和经济史》145页。纪念葡萄牙发现事业澳门地区委员会出版,1993年。

[4]同[3],216页。

[5]同[3],113页。

[6][9][14][20]安东尼·博卡罗(Antonio Bocarro)著,张廷茂节译《中国阿妈之城》,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编《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第5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

[7][15][17][19][20][24]C.R. 博克萨:“16-17世纪澳门的宗教和贸易中转港之作用”,《中外关系史论丛》第5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

[8]同[3],230页。

[10]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卷上,《官守篇》引庞尚鹏《区画濠镜保安海隅疏》。

[11]《明实录·穆宗实录》卷三十八,隆庆三年十月。

[12]《明实录·熹宗实录》卷十一,天启元年六月。

[13]《明实录·崇祯长编》卷三十四,崇祯三年五月。

[16][42][47]黄启明、郑炜明:《澳门经济四百年》3页,“1555-1990年澳门人口发展统计表”。澳门基金会出版,1994年。

[18]同[3],216页。

[21]郝玉麟:《广东通志》卷六十二,吴兴祚《议除藩下苛政疏》。

[22]李士桢:《抚粤政略》卷六,《禁奸漏税》。

[23]同[3],216页。

[25][26][28]李士桢:《抚粤政略》卷二,《请除市舶澳门旱路税银疏》。

[27]陆希言:《澳门记》。转引自《澳门经济四百年》67页。

[29]强克斯脱(Andrew Ljungstedt):《葡人在华殖民史略》(英文版)85-86页。转引自《澳门经济四百年》70页。

[30]《葡人在华殖民史略》132页,转引自《澳门经济四百年》71页。

[31]《清实录·世宗雍正实录》卷二十九,雍正三年二月。

[32]张甄陶:《澳门图说》,转引自《澳门经济四百年》72-73页。

[33]《清实录·宣宗道光实录》卷三百二十九,道光十九年十二月。

[34]《清实录·高宗乾隆实录》卷一千四百三十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

[35]《清实录·宣宗道光实录》卷一百五十八,道光九年七月。

[36]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卷上,《官守篇》。

[37]《清实录·仁宗嘉庆实录》卷二百一十二,嘉庆十四年五月。

[38]邓开颂、黄启臣编:《澳门港史资料汇编(1553-1986)》358-35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39]同[38],375页。

[40]围墙是葡人于17世纪初开始陆续修建的界墙,最早的围墙建于圣保禄教堂(今大三巴牌坊)之北。关闸即香山县通往澳门的陆路界口,清政府于1684年于此设税馆,复于1887年在此设拱北海关,今为珠海与澳门交界处。

[41]同[16],110页。

[43]同[16],163页。

[44]同[16],166页。

[45]同[16],168页。

[46]同[16],4页。

[48]同[16],173-175页。

[49]《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Macau》p. 187, Edited by Rufino Ramos, etc.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Macau & Macau Foundation, 1994.

[50]王文祥:《港澳手册》446页,中国展望出版社,1991年。

[51]Rufino Ramos, ibid, p. 172.

[52]陶在朴:“澳门发展研究的耗散结构未来观”,《澳门研究》第1期,6页,1993年9月。

[53]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2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作者陈衍德:厦门大学历史所;邮编:361005。